

# 邓小平小康社会建设路径与意义研究

姜长青<sup>1</sup> 邢孟军<sup>2</sup>

(1.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044; 2.中共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浙江 宁波 315000)

**摘要:** 小康社会建设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邓小平提出小康社会概念既是基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刻了解,又是对中国国情的现实把握,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认为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坚持基本路线、坚持节俭和谨慎、重视教育科技、加强中央宏观管理能力以及维护世界和平等,同时,其对于小康社会建设的意义也做了多方面的阐述。

**关键词:** 邓小平; 小康社会; 基本路线; 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 D2-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4937(2021)01-0043-05

## 一、邓小平提出小康社会建设的历史背景

邓小平“小康概念”的提出,既是基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刻了解,又是对中国国情的现实把握,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1. 小康观念在中国有着非常长的历史传统。“小康”一词很早就出现在《诗经·大雅·民劳》中,“民亦劳止,汙可小康,惠及中国,以绥四方”,其大意是让百姓休养生息,惠及天下。后孔子又提出小康、大同的社会理想。小康介于温饱与富裕之间,成为千百年来一般民众对美好富足生活的理想和不懈追求。小康观念根植于中华文化,并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回答日本大平首相关于中国未来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问题时,提出了“小康”概念。其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是“小康之家”,而不是国外学者理解的现代化概念。到20世纪末,中国国民生产总值

人均水平即使达到了一千美元的水平,但同西方国家相比,也还是落后的。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同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会谈时再次重申了小康概念,他说“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sup>[1]</sup>

邓小平对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洞察力,善于把传统文化和中国现实发展问题结合起来。1988年8月26日,其会见日本首相竹下登时,回顾了提出小康目标的过程:大平先生对我们在本世纪内翻两番目标的确立发挥了重要作用。就中国来说,目标不能定得太高。为了防止产生急躁情绪,避免又回到“左”的错误上去,有必要把目标定低一点。“小康之家”是中国历史上就有的说法,而小康社会就是还不富裕,但日子好过。邓小平还提出只有进行重大改革,中国才能在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sup>[2]</sup>。

2. 小康思想是在吸收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党和政府对社会经济的目标一直处在探索之中。1954年,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要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国家。经过艰苦的经济调整,1964年12月,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即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研究(1949—1965)”(16FJL020);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工业化市场化进程中的农户家庭经济研究: 一个以‘无锡、保定农村调查’为基础的长时段视角”

作者简介: 姜长青, 1975年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邢孟军, 1971年生, 中共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博士。

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975年,他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了这一目标,并提出在20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这对于中国当时的国情来说,仍然是一个很高的目标。

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中国在世界各国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这是改革开放前后最急需了解的问题之一。为此,中国政府派出了大量赴欧美等国家的考察团,考察团对所考察的对象国和地区进行了认真的调研学习,无不深感中国发展的滞后和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社会等各个领域取得的巨大进步。在考察团回国后所写的报告和所作的汇报中都透露出要抓紧时机谋求我国的发展,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并提出可以利用西方国家的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想法。1978年,邓小平对日本和东南亚国家进行了一系列出访;1979年初又访问了美国,而事实上这些出访也使邓小平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了解极大地增加,其思想和观念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美国访问归来后,邓小平对中国的发展有了新的认识和思路。1979年3月30日,他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10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又说“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sup>[3]</sup>此后,邓小平又把中国式的现代化和小康联系起来。

随着对发达国家的了解,邓小平提出的目标更加务实,也更符合中国实际。他指出,中国四个现代化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达国家人均年收入五千至七千美元。而中国人口太多,要达到发达国家那样的现代化,一定时间内还不现实。中国平均每人年收入达到一千美元,实现“小康之家”的目标,也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20年内大体上增加三倍,这也是不容易的事情。另外,他几次提出,在本世纪末,我们只能达到一个小康社会,日子可以过。达到一千美元也不容易,比如说八百、九百,就算八百,也算是一个小康生活了<sup>[2]</sup>。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要建设的小康社会,实际上是使中国摆脱贫困,为下一步发展打下

坚实基础的特定期阶段。同时,他反复强调制定政策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目标不能定得太高,太高就容易陷入空洞;步子要稳,步子迈得太快,也会带来灾难。事实上,邓小平对新中国以来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非常了解,这在确立中国小康建设目标时也起到了非常大的历史作用。

此外,邓小平提出小康社会目标也与国际共运的经验教训有关。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对中国的工业化建设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思想和实践对中国更是有极大的影响。但事实上,苏联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规划和建设目标上曾经出现过很大的失误。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吸取了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目标问题十分清醒和自觉,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制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邓小平指出“我们不讲大话,讲大话没有用。中国底子薄。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一九七九年底我们考虑花二十年时间达到小康水平。”<sup>[2]</sup>

3. 提出小康是适应农村改革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0%左右,而提高这80%人口的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政策成功的关键,事实上,农村的稳定关系到全社会的稳定。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拉开帷幕,并以此推动全国的改革发展。在农村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了小康之家的概念,这对于引导鼓励广大农民积极投身改革、拥护改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对于农村率先改革所带来的成绩,党的十二大报告作了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首先抓住农业这一环,着重克服过去指导上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恢复和扩大农村社队的自主权,恢复自留地、家庭副业、集体副业和集市贸易,逐步实行各种形式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同时提高了粮食和其他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随后又解决了多种经营的方针问题,从而使农业面貌很快发生显著变化,由原来的停滞不前变得欣欣向荣。广大农民多年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过。这也是

对这一时期农村改革成果的生动总结。

邓小平指出对内经济搞活,首先从农村着手。农村所进行的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农村改革的中心之一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包产到户政策的实施,实际上是废除了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经济制度,农民从土地和户籍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发展乡镇企业、搞活商业,多渠道增加了就业,收入水平提高很快。农村建设和农民的精神面貌短时期内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搞活了,人们的思路也开阔了,国家实力也增强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有了推进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底气。

## 二、关于中国如何实现小康的路径分析

中国国家大、底子薄、基础差,人口多、耕地少,人口压力大,科学技术力量不足,经济上属于发展中国家之一,资源短缺问题复杂,这些因素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阻碍力量,也是中国进行经济建设所必须面对的问题。邓小平还预见到,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在国际上遇到的压力和竞争会越来越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中国面临的国际竞争会相当激烈。对于在这种复杂的条件下如何实现小康,邓小平做了深刻的思考。

1. 必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我们党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国内经济长期存在的一些问题也随之凸显出来,如有些地方农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农村生活普遍比较差,贫困人口大量存在;城市待业人数多,知青回城问题激化,职工待遇等问题长期没有改善;经济缺乏活力,民生领域落后等。邓小平对中国国情进行了认真的调研,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要解决主要矛盾,就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了更加坚实的支撑。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政治保证,是立国之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有坚定正确的方向、有团结稳定的环境、有统一的意志和行动,而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保证经济工作的正确方向。邓小平认为中

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没有别的道路可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实现“小康”的根本制度保障。

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应该和其他社会一样不断进行改革。中国社会主义受苏联模式影响很深,一些旧的观念和体制机制阻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邓小平认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中国发展只有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彻底改革,才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对此,他指出要发展自己,就要坚持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政策,而要搞活经济,要开放,就必然要推进改革,同时只有深化改革才能为今后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改革开放没有回头路,只有推进综合性改革,才能保证在本世纪内达到小康水平,并在下个世纪更好地前进。当然,对于改革中的风险,他强调要有充分的应对措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局部冲突不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陷入冷战状态,但总体上用革命和战争解决国际问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时代主题已经由革命与战争转为和平与发展。由于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世界几乎可以连为一体,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置身于世界之外。邓小平从总结我国的经验教训出发,认为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只有对外开放。对外开放不但可以充分利用我们自己的力量,也可以善用国际力量。对外开放是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改革开放是实现我国现阶段奋斗目标的必经之路。

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定了党在这个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十三大报告根据中国国情和邓小平的设计,确定20世纪后20年和21世纪前50年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并指出实现战略目标的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

2. 建成小康要有艰苦奋斗的作风和谨慎的态度。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建设小康社会任务的艰巨性。邓小平充分考虑到了中国建设小康社会所可

能遇到的困难,他认为首先要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正确处理消费与积累之间的关系:“在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中,还不能浪费,不能把经济发展的成果通通分掉,那样再生产、再发展就没有希望了。”<sup>[2]</sup>如果中国发展过程中不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到20世纪末实现一个“小康之家”的现代化目标就不能够达成。

中国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占有资源少,而我们面临的国际竞争却相当激烈。要对外开放就必须面对世界市场,邓小平认为面对世界市场一要大胆,二要兢兢业业、小心谨慎。依据国际贸易分工理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要素价格、市场容量等方面具有很大优势,中国应充分利用这些优势,利用国际资本技术管理,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此外,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对国际贸易国际规则还有很多不熟悉的地方,这就需要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多学习,按照国际贸易规则行事,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小心谨慎。

3.加强中央权威,提高宏观管理能力。中国是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内外问题复杂,发展、改革与开放的任务很重,如果协调不好,就可能出现倒退甚至失败。针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邓小平强调要加强中央权威,增强中央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改善宏观管理方法。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推进,一些深层次问题开始暴露出来,这些问题往往牵涉面广,积累时间长,社会影响范围广,解决起来难度大。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往往需要中央统筹全局,综合兼顾各方面的利害关系,稳健地推进。而这就需要中央有权威,地方服从中央。中央有权威是改革成功推进的需要,也是统筹两个大局发展的需要。中央在进行管理时要注意不能损害改革开放政策,要保持适当的经济发展速度,不能使经济萎缩。同时,中央要改进宏观管理方式,现在的宏观管理方式应是走向小康社会的宏观管理方式,中央行使权力要集中在大的方向性的问题上。

4.大力发展教育和科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指出21世纪是高科技的世纪,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目前,我国许多企业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

落后,大批职工缺乏必要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操作技能,熟练工人和科学技术人员严重不足。党的十三大报告也指出“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管理是提高经济效益的决定性因素,是使我国经济走向新的成长阶段的主要支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技术落后,管理落后,靠消耗大量资源来发展经济,是没有出路的。离开科技进步和科学管理,不可能在有限的耕地上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和其它农产品,也不可能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保持目前的温饱水平,更谈不上向小康以至更高水平前进。”

20世纪90年代美国提出建立“全美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互联网等新兴技术方兴未艾,新知识新技术呈现爆炸性增长。邓小平敏锐地捕捉到世界科技发展的变化,1992年其南方谈话中对科技的发展作了进一步强调“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近十几年来我国科技进步不小,希望在90年代,进步得更快。”<sup>[1]</sup>

5.维护世界和平,为中国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曾长期饱受战争的困扰,深知战乱对国家的破坏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到其他国家的封锁包围和禁运。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专家,断绝了对中国的技术援助,后又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中国周边环境恶化,严重影响了对世界主题和形势的判断,这也是我们长期不能把主要精力放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认为,中国的发展要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他在分析世界主要力量后指出,有资格发动世界大战的只有美国和苏联两个国家,但现在这两个国家自身都面临不少问题,短期内发动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不大。由此,中国要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发展经济来摆脱落后,然后再花30年到50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中国的

对外政策概括起来就是反对霸权主义、争取世界和平。

### 三、关于中国小康社会建设的意义

作为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小康社会建设不但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前途命运,而且对世界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邓小平认为,中国小康社会建设有着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1.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贡献。1978年,中国贫困人口数量为7.7亿人,其中,农村贫困发生率为97.5%,中国的贫困问题也成为当时世界关注的一大突出问题。要解决贫困问题,必须发展经济,增加人民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中国贫困人口的减少不但事关中国人民的福祉,也是对世界减贫事业的重要贡献。1982年11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由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人民的生活很困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变了这个局面,现在我们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就是要使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达到小康状态,摆脱饥饿和贫困。中国经济达到20世纪末翻两番这个目标,就是要使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摆脱贫困,这也是为人类做了一件大事情。他还提醒道,经济发展目标不能定得太高,步伐不能迈得太快。

2.有利于世界和平力量的增强。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积贫积弱,长期以来受外国的侵略,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为寻找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而发动战争,致使中国国内政局动荡,战乱频发,民不聊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坚定地维护世界和平,而中国的发展也意味着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在不断增强。邓小平认为,通过建设小康社会,使国家的综合力量增强,再加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就有很大的可能性避免世界战争。到21世纪中叶,中国将更加强大,对世界和平就更加有利。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中国每发展一步,就使国际和平力量增加一分。中国要同其他和平力量一道推动世界和平发展。

3.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经验和帮助。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同样世界发展也离不开中国。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不但意味着世界和平力量的增强,还意味着来自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支援力量的增加。事实上,随着中国小康社会建设取得成效,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中国将会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宝贵的减贫经验。

邓小平更是将中国的发展视为对人类社会的贡献。1985年3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19位美国新闻界人士组成的“重访中国团”时指出,中国有信心在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的时候,对人类社会作出的贡献会更多一点;到21世纪中期中国发展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时候,对人类的贡献也会更大一些。中国对不发达国家的贡献,既包括提供如何发展自己国家的经验,也包括提供较多帮助给不发达国家。

4.证明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马克思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由于克服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代表了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有着资本主义所无法比拟的社会制度方面的优越性。但由于历史和现实方面的原因,社会主义国家在现实中许多方面还落后于资本主义。邓小平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正确处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内的当今世界各国的一切促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中国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但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的说服力还不够强。只有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时,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才能有广泛而充分的说服力。

#### 参考文献:

-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责任编辑:王雅莉]